

# 论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观<sup>①</sup>

王晓农



**摘要:**语文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为基础的三个主要翻译批评传统,各自聚焦于翻译过程的不同环节,都存在一定片面性。本文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相关理论和翻译观,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观,探讨了这一批评观对以往主要翻译批评传统之不足之处的弥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关注作者、文本、译者、读者、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以文本的认知世界分析为主要过程,以文本之间的认知世界最佳相似性为主要标准,强调翻译过程诸因素动态、和谐的多重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往翻译批评观的不足。

**关键词:**翻译批评;认知语言学;认知世界;模式

## Towards a View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on the Basi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Xiaonong

**Abstract:** Each of the three major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riticisms, based on philology, 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vism respectively, focuses on a different single link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refore, they are one-sided. In light of the basic tenets and relevant theor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and the CL-based translation theory, a CL informed view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proposed, which is intended to be helpful in conducting more thorough, insightful, and accurate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practice. The CL-based translation criticism considers more fully the author, texts, translator, reader, cognitive world and actual world, takes analyzing the cognitive worlds of the texts as the main procedure and the maximum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extual cognitive worlds as the main criterion, and highlights the dynamic and multipl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ose element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which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three traditional view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Keywords:** translation criticism;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world; mode

---

<sup>①</sup>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易传》核心思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概念化研究”(项目编号:19CWZJ13)的阶段成果。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体验认知、与语义紧密相连、以语言操作为主的活动。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以下简称CL)以现实、认知和语言的关系及概念结构和意义为研究的中心问题,关注话语通过概念隐喻或话语所构建的心理空间及概念整合网络来表达思想(包括隐含意义)的机制。所以,翻译和CL存在天然的内在联系。40多年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和文化研究对文学译作评估产生了直接影响。国内学者近年来在CL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方面已取得较多成果,但在将CL理论观点应用于翻译批评的理论探讨尚不多见。翻译批评<sup>①</sup>指涉的是翻译活动中的文本或事件,因而翻译批评及其研究自然需要CL的介入。CL可以把蒙田式“阁楼写作”和笛卡尔式“炉前思考”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前者对信念进行探索、提炼、写作,写作和论说的过程就是思维过程,而后者通过层层剥离而依据某些规则重建现实(Freeman,2007)。CL能够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其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视角,也可为这些领域的发现提供解释。翻译批评史上的三大翻译批评传统,即语文学传统、结构主义传统和解构主义传统,都存在着片面性,基于CL的翻译批评观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上三种翻译批评观的不足。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以往翻译批评传统理论观点存在的不足,结合体验哲学、CL和CL翻译观,采用文献研究和内省法,探讨CL的翻译批评观对以往翻译批评观不足之处的弥补,并对基于CL的翻译批评观和批评模式进行概念性探讨,为建立基于CL的翻译批评理论奠定一定的基础。

## 1. 历史上主要翻译批评观回顾:西方视角

无论东西方,翻译批评远不如文学批评发达。评价译作远比评价原作复杂,在翻译批评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困难,但广大翻译家和学者还是越来越认识到翻译批评的重要意义。Holmes(2000)把翻译批评置于翻译学中应用翻译研究领域。有的学者强调翻译批评作为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介的重要性,如Newmark(1988)、王宏印(2017)。从历史上看,西方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是紧密联系的,翻译理论是构成翻译批评的主要基础。因此,可从翻译理论的流变看出翻译批评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尽管实际状况纷繁复杂,但若从主流观点出发进行粗略划分,大体可以说西方翻译批评经历了语文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三个阶段(王宏印,2010)<sup>41-46</sup>。以下结合其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和翻译理论就这三个阶段的翻译批评略做分析。

语文学翻译批评是古典的翻译批评,其哲学基础是经验论,语言学基础是现代语言学前的古老语文学。客观主义经验论过分强调作者权力,认为语言具有十分精确的表征和再现客观世界的功能,人们只要透过语言就可精确了解世界。语文学翻译观认为翻译首先要服务于原作者,将作者视为主人,译者仅是仆人,译文必须“忠实”于作者原意,应与作者原意具有镜像关系。这种翻译批评主要是以原作者为准绳,借助译文正误

<sup>①</sup> 本文所述翻译批评主要指文学翻译批评。

的多寡来判断译文质量,过于纠缠于错误识别,评估的主观性强,导致后来许多学者主张描写性评判,尽管后者也不是没有问题。语文学翻译批评的着眼点在于标准问题,从属的是技巧问题;考虑和讨论的焦点,首先是作者本位,其次是文本本位,再次才是别的方面;翻译的作用和译者的地位往往被贬到忠实与否的准伦理化地步(王宏印,2010)<sup>33</sup>。因此,语文学翻译批评关注的中心主要是原作者。

结构主义翻译批评的哲学基础主要是笛卡尔的唯理派哲学,语言学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西方哲学出现认识论转向后,理性被视为知识唯一的来源,20世纪初建立的现代语言学将语言研究视为一种纯理性行为,排除人和社会文化的因素,把语言看成以这些因素为围墙的封闭体系,因此其视点不可避免地转向语言的系统、结构和内部规律。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只要通过细读文本本身,努力挖掘文本的言内意义或潜在意义,就可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李弘等,2005)。结构主义翻译观主张原作有确定的意义,译者应从文本内部结构分析入手来获得文本意义,不必考虑文本外的东西;把翻译视为等值或等效地转换成另一种文字的过程和结果,译者的中心任务就是将确定的意义忠实再现出来。结构主义翻译批评在理论上关心的是不同语言系统之间有无可译性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可能仅靠语言学解决;它在关心语言问题科学性解决的同时,往往舍去了语文学翻译批评最擅长的艺术性解决方式(王宏印,2010)<sup>45</sup>。总之,结构主义翻译批评是一种文本中心论。

解构主义翻译批评建立在欧陆解释派哲学的基础上。20世纪的西方哲学转向语言论后,语言分析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欧陆解释派哲学如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等流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把研究注意力转向了语言交际的“读者”这个环节,读者也就成了文本意义的决定者。这样,原文的意义失落于无限的理解和解释可能性之中,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李弘等,2005)。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作者和原作的意义乃至生命只有依赖译者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在新的时空中得以延续,提出了“翻译就是再创作”这一命题。译者应不断挖掘原文隐含的各种潜在意义、不断赋予文本崭新生命。解构主义对文本权威和统一性的否定冲击了以往的评价系统,传统标准如“准确性”“正确性”已不具有相关性。有的解释派学者认为,译者对原文的解释和译文的产生都是个人的、创造性的行为,难以进行系统化、普遍化和规则化(House,1998)。后殖民学者不否定译文的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和权力关系造成的翻译“失误”。在这两种情况下,译者的登场和作用被突显,翻译评价标准也发生改变。这一理论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战略,关注翻译作为文化介入手段在主体文化中的影响和效果。解构主义翻译批评最关心的与其说是文本和语言,毋宁说是文化和交流;与其说是翻译和转换,毋宁说是理解和解释;与其说是标准和方法,毋宁说是传播和分延(王宏印,2010)<sup>46</sup>。因此,这一翻译批评关注的是读者—译者因素。

以上三种翻译批评观分别聚焦于翻译过程的三个主要环节,形成了不同的侧重点。虽然三者翻译批评中各具优势和理论价值,也能在实践中说明不少问题,但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片面性。王宏印(2010)<sup>47-51</sup>指出,当前翻译批评思潮的三个转向是:主体方

面从作者中心、译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落实在读者反应的基点上;方法方面从艺术鉴赏型、科学分析型转向文化评论型,以文化批评为重点;研究范式从规定性和描写性转向解释性理论说明,但仍以描写性为基本方式。关于在中西学术交汇语境下如何发展中国翻译批评,国内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探索,例如王宏印著《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06)和《文学翻译批评论稿》(第二版)(2010)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他的翻译批评研究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探索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许钧,2018)。王宏印(2010)<sup>47-51</sup>认为,在主体关系上应保持基本的动态平衡关系,在方法上应努力建设本民族的独特的研究话语,同时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在研究范式上追求以质的规定性为概念基础,以过程描述作为主要倾向,同时不排除价值和非价值判断而又具有文化解释力的理论,作为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完整方法论模型。下文主要从 CL 有关理论观点出发,分析 CL 翻译批评观如何对以往传统翻译批评观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

## 2. 认知语言学及其翻译观

就 CL 的历史发展而言,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语言理论,而是一个灵活的研究框架(Dirven et al., 2007)<sup>3</sup>。其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心理学基础是认知心理学。体验哲学认为,人的心智和思维产生于人跟外部世界的互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身体获得经验,人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植根于知觉、身体运动和人在物质和社会环境中的体验。同时,人的概念和概念系统的形成要受人类身体构造的制约。CL 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其特点是着重阐释语言和其他认知能力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语言是人们对现实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产物,这正是 CL 对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语言理论之革命的意义所在(王寅,2012)。CL 认为语言不是直接表现或对应于现实世界,语言对现实世界的反映需要借助中间的“认知建构”层次,将语言表达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这个认知中介层或认知世界是人通过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认知形成的动态的各种概念和概念结构。现实世界通过认知世界“折射”到语言表达上,语言表达也就不可能完全对应于现实世界。CL 的研究思路是挖掘语言背后的人性特点和人本要素,着力探讨语言如何通过体验和认知而形成,分析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探究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王寅,2012)。对各种各样的语言现象,CL 都可以从认知上作出充分解释,但是不可能做到完全预测,因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系统,凡是复杂和开放的系统都无法做到完全预测(沈家煊,2006)。意义和语义研究是 CL 的中心领域。在语义问题上,与传统客观主义语义学不同,CL 认为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跟人的概念结构和概念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直接关系,语义是语言符号与认知主体互动的产物,是体验性概念化的结果(王寅,2017)。语义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它与视角有关,是动态的、灵活的、百科的、非自治的,也是基于用法和经验的(Dirven et al., 2007)<sup>4-6</sup>,强调语义的认知观、互动观、整合观和整体观(格式塔观)等方面。CL 的主要理论有范畴(化)、概念(化)、意象图式、认

知模型、认知语义学、认知语法、象似性、语篇、隐喻等,在文化、文学及其批评、翻译、语言教学等研究领域也获得了广泛应用。就目前 CL 的研究来看,对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语言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考察似乎关注不够。近年来 CL 在批评领域的进展包括意识形态批评(Dirven et al., 2007)<sup>4-6</sup>,CL 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如 Chilton(2004)、张辉等(2008),也有学者提出建立批评认知语言学。

CL 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语言研究上的一次革命,也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分析语言的新方法,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后现代人本哲学的主要精神,反映了当前世界人文研究的基本取向,这样,语言学终于能与文学及翻译学进行理论对话了(王寅,2012)。涉及不同语言和文化(可视为一种认知模式)的翻译是一种体验认知活动,因此和 CL 有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语言和思维有密切联系,只研究语言而不探讨思维,就不能诠释翻译的本质(陈道明,2005)。语言的体验性本质使不同的语言文化具有通约性,彼此具有基本的可译性,而使用不同语言的认知主体的认知方式差异造成了翻译困难。语言可使作者运用最少的语法结构构建出适合某一语境的具有丰富意义潜势的文本,而文本可提供很少但却足够使读者能找到在某一语境下用于意义建构的线索(法康尼尔,2008)。若读者能够在心智上建立一个连贯统一的文本认知世界,就说明他理解了文本。CL 翻译观认为,翻译本身在本质上具有体验性,翻译中理解原文和生成译文的过程都是以译者的体验认知为基础的,是在双方的现实世界、认知世界和语言世界的多重互动中实现的。从语言翻译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人”与“本”、“人”“本”与“现实”、译者与读者等)作用为认知基础,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原语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认知世界和现实世界(王寅,2007)。翻译的认知原则是根据对翻译制约参数的考量,追求译文与原文在认知世界上的最佳相似性(王晓农等,2019)。从认知世界的角度而言,译者的翻译目标可以概括为使译入语文化中的目标读者能够在译文文本语言符号引导下建构译者所期待的、与目标读者的认知世界统一的译文认知世界。这应该是译文构建的认知前提,而译文表达是译者对原语文化中原文的理解和对翻译目的、目标读者和译语语言文化等因素理解整合后形成的。CL 翻译观除了强调翻译的体验性、多重互动性、语篇性,还强调一定的创造性。一方面,体验性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思维的共通性、可译性,约束了创造度的范围,另一方面,人类认知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而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理解和多种译法,这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所以完全客观地翻译原作者的意图是不可能的,完全忠实于原作者的文本意思是不可及的,译者应做的是尽量较好地理解和反映原作所反映的主观世界和现实世界,创而有度(王寅,2007)。总之,在翻译过程中,应根据 CL 的原则充分考虑作者、文本、译者、读者、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的互动关系,从而避免基于传统语文学作者中心论、结构主义文本中心论和解构主义读者中心论等翻译观的不足。

### 3.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批评观

若将 CL 理论观点作为翻译批评的理论基础,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三大翻译批评传统的不足。CL 翻译批评观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语言学基础是 CL。其翻译理论基础是上文所述的 CL 翻译观,该理论强调翻译的体验性、整合性、语篇性、多重互动性、有限度的创造性、伦理性,具有系统和谐性特征(王晓农,2011)。在下文中,笔者主要针对以往翻译观的不足,论述 CL 翻译观的基本特征和模式。

#### 3.1 CL 翻译批评观对以往翻译批评传统的弥补

翻译过程和翻译批评观的关系大致如图 1 所示,图中实线圆圈表示客观存在的实体或相对稳定的系统,虚线圆圈表示有一定稳定性的状态,双箭头实线表示互动关系,单箭头实线表示关注对象,单箭头虚线表示相关对象,线的粗细表示关系程度大小。<sup>①</sup>这个图表现了简化的翻译过程和各種翻译批评的关注对象。之所以说简化了是因为这里将翻译过程简单分为理想化、一次化的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各种翻译批评观也只标出了其关注的中心对象。对于翻译过程,可略做如下说明。原语语言(文化)1 中的作者通过原语语言文化知识与所欲表达的思想、意图整合,生成原文。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原文语言符号进入译者的认知世界,经互动整合机制而成新概念化,译者理解原文;这一理解再经和译者认知世界,尤其是涉及译入语语言(文化)2 的知识、翻译目的和读者知识等,整合而重新语言符号化为译文。原文的遣词造句最终要落实为译入语言符号化的译文文本(王晓农,2021)。另外,图 1 中还表示了原文读者 1 对原文和译文读者 2 对译文的读解过程。第二节论述的三大翻译批评传统分别以作者(以原文为中介)、原文和译文、读者—译者为关注中心。如图 1 所示,CL 翻译批评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三大翻译批评传统的不足之处。

前文指出,翻译的原文理解和译文生成过程是以译者的体验认知为基础,在涉及双方的现实世界、认知世界和语言世界的多重互动中实现的。这里的多重互动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至少涉及“人”与“本”、“人”“本”与“现实”、译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因此,翻译批评就离不开对这种多重互动关系的指涉。根据“人”和“本”的互动关系,不管是以作者为中心的语文学翻译批评观,还是以读者为中心的解构主义翻译批评,都是只关注“人”,而结构主义翻译批评则只关注“本”,三者都是片面的。就译者和读者的互动来看,译者不是一般的读者,他是读者兼译者,他具有一般读者所不具备的双语、跨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同时

<sup>①</sup> 本图借鉴了 CL 概念整合理论的思路,由双箭头实线连接的两个圆圈可视为输入空间(input),两个圆圈下方的圆圈是“整合空间”(blend),表示整合结果。图中没有显示“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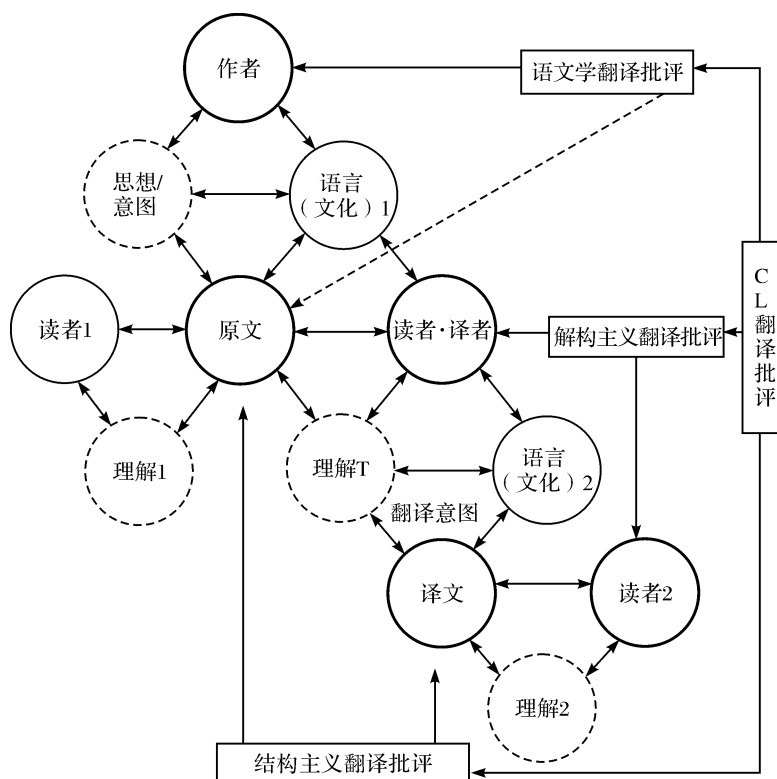


图 1 翻译过程和翻译批评

他还具有一定的创作主体身份,但是他的这种双重身份和他与作者、文本、读者的基于体验的互动关系使他受制于有限度创造的原则。CL 认为,人的语言和文本都是基于人通过相似的身体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这种体验性制约了作者的文本生成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作者不会说出一些违背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而无法为读者所理解的语句来,而读者对文本所作出的理解也不会无限超越或违背它。因此,读者对原作做适度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个人都有其自己的认知能力,但这只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控制力正是来自体验互动(王寅,2008)。语文学翻译批评观在评判译文时,排除了读者和译者对文本有主观理解和翻译的可能,极力强调对原文“忠实”的标准,以此寻找译文的错误并以错误数量衡量译文质量,这在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结构主义翻译批评过分强调文本自身,把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关系作为批评标准的首要因素,忽视人的认知加工在文本理解和翻译中所起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作用,也忽视了社会现实对语言的影响,这在理论上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而解构主义翻译批评则过分夸大了译者的创造性。由此可见,三者的不足都可以由 CL 翻译批评观加以弥补,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翻译批评观。

### 3.2 对基于 CL 的翻译批评模式的初步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CL 翻译批评观弥补了三大翻译批评传统的不足,形成了具有内在和谐关系的翻译批评观。它的关注要点包括作者、文本、译者、读者、认知世界

和现实世界,体现为图 1.1 中的各个圆圈所表示的实体、状态和系统及其间基于体验认知的多重动态互动关系。House(1998)指出,任何试图对译文的评价都必须把这个事实作为出发点,即翻译就性质上讲是同时与原文和制约译文在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系统中的接受的条件相联系的。这也是 CL 翻译批评的模式建立的基点。在涉及具体的翻译批评操作时,CL 翻译批评最终要落实到译文和原文在文本认知世界的关系确认上。CL 本身对微观层面的分析关注较多,因此可以适当考虑社会认知即对社会安排、组织和关系以及解释、思维、推理和学习等心理操作共享的表征的认知(张辉等,2008)方面的补充。以对某译文的翻译批评为例,本文提出的概念性模式的运作程序可简要描述如下。

首先,分析制约译文产生的诸因素,包括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译文和译文读者,阐明译者翻译的原因和目的。在评价今天或过去的译作时,批评者应了解译作产生的文化背景,而且要了解译作产生时代的评价尺度和自己的评价标准间的关系。如果作者、译者、批评者属于不同时代,批评者需要了解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诗学审美特征、译作评价标准以及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条件,对不同时代的译者也需要做如此了解。批评者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情况也应熟悉。由此形成对翻译事件发生背景的较为宏观的整体性认识,作为设定译文和原文认知世界最佳相似性标准的参照系。其次,进行文本分析。对原文和译文做出语言学特征方面的描述;把原文和译文各作为独立文本,借助 CL 的相关理论,例如认知模型理论、隐喻理论、认识世界理论以及认知诗学等,对原文的认知世界及其反映的现实世界和译文的认知世界分别进行文本分析,并加以充分描述。这里也要考虑译者可能在译文的副文本中提及的翻译策略、原则,并考察在译文中的落实情况。最后,对译文和原文的文本认知世界进行比较分析,确立两者在认识世界上的关系,根据第一步确定的认知世界最佳相似性标准对其关系进行评价。评价所涉方面主要包括译本作为独立文本与译入语文化系统的亲和性、译本和原本在认知世界上与文本认知世界最佳相似性原则的符合程度、译本与原本在认知世界上的主要不同之处及其语言表现,并对其做出基于 CL 的解释,同时分析这些表现可能意味着的翻译方法、语言运用和翻译理论上的创新。对具体译作的最终评价可以等级化。以上仅是尝试对 CL 翻译批评概念性模式所做的一个纲要型、粗线条的说明,还需要继续进行细化研究,使之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可行性。

#### 4. 结语

本文首先从西方视角回顾了文学翻译批评史上三个主要的翻译批评传统,分析了各自存在的不足,然后介绍了 CL 的基本观点和相关理论,并分析了基于 CL 的翻译观,在此基础上探讨了 CL 翻译批评观对以往翻译批评传统不足的弥补,初步提出了基于体验哲学和 CL、强调多重互动的、和谐的翻译批评观,最后尝试概念性地探讨了 CL 翻译批评模式。翻译是一个复杂系统,是许多方面和因素互相作用的综合矢量结果,它永远



也不可能达到实时均衡状态,而总是处在不断展开、不断转变之中。基于 CL 的翻译批评观关注作者、文本、译者、读者、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等因素,把这些因素看作处于动态的多重互动关系之中。CL 正在发展之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其内部学者之间的学术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是,其基本理论主张是一致的、明确的,对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基于 CL 对翻译批评的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并能引起更多学者对 CL 和翻译批评进行整合研究的关注。

### 参考文献:

- 陈道明,2005. 隐喻与翻译: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9):40-43.
- 法康尼尔,2008. 心理空间:自然语言意义建构面面观[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40.
- 李弘,王寅,2005. 语义理论与翻译研究: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的解释力[J]. 外语与外语教学(10):35-39.
- 沈家煊,2006.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假设[N/OL]. 光明日报,7-3[2022-9-1]. <https://www.gmw.cn/01gmr/2006-07/03/content443360.htm>.
- 王宏印,2010.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2 版.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宏印,2017.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88.
- 王寅,2007.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565-592.
- 王寅,2008.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 篇英语译文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3):211-217.
- 王寅,2012.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学前沿:体验人本观与认知语言学[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6):17-26.
- 王寅,2017.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J]. 中国翻译(6):5-10,17.
- 王晓农,2011.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语篇翻译研究[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88-294.
- 王晓农,2021. 令文义圆通,使微言不坠:鸠摩罗什佛经翻译“圆通论”诠释[J]. 中国翻译(2):29-36.
- 王晓农,赵红梅,2019. “B 是 A 的译文”,意味着什么?:试据对唐诗“清明”及其英译的语篇认识世界分析进行解答[J]. 语言教育(4):63-69.
- 许钧,201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20.
- 张辉,江龙,2008.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会话语批评分析的融合[J]. 外语学刊(5):12-19.
- CHILTON P, 2004. Metarepresentation, discourse and discourse spaces[M]//MARQUES M. Praticas de investigacao em analise linguistica do discurso-actas do II encontro internacional de analise linguistica do discurso. Cehum: Braga.

- DIRVEN R, POLZENHAGEN F, WOLF H G, 2007. Cognitive linguistics, ideolog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GEERAERTS D, CUYCKENS 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M, 2007.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literary studies: state of the art in cognitive poetics[M]//GEERAERTS D, CUYCKENS 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76.
- HOLMES J S, 2000.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72-183.
- HOUSE J, 1998. Quality of translation[M]//Baker M.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7-200.
-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78.

作者简介:

王晓农,男,1969年11月生,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科研副院长,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孔学堂》英文译审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2015年获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学位。其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与译论研究,研究课题涉及《易经》、“四书”、《朱子语类》、《古文观止》等典籍英译、莎剧汉译以及中国当代学术外译等领域。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级科研教学项目4项,参与国家级项目8项;在国内外出版学术专著、译著14部,教材3部。英语译著《朱子语类选》《古文观止》入选“大中华文库”。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周易研究》、*Translation Journal*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中英文论文80余篇,发表国学研究论文英语译文40余篇。典籍英译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厅市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